



1933 — 1973

美国史

下 卷

杜鲁门—尼克松当政时期：1945—1973

拉尔夫·德·贝茨著

1933—1973

美国史

下

杜鲁门—尼克松当政时期：1945—1973

〔美〕拉尔夫·德·贝茨著

南京大学历史系英美对外关系研究室译

吴世民 沈宗美校

封面设计：王 师 颖

RECENT AMERICAN HISTORY

Volume II

1945 TO THE PRESENT

RALPH F. de BEDTS

The Dorsey Press, Homewood, Illinois, 1973

1933—1973

美 国 史

下 卷

杜鲁门——尼克松当政时期：1945—1973

〔美〕拉尔夫·德·贝茨著

南京大学历史系英美对外关系研究室译

吴世民 沈宗美 校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顺义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6.25 印张 404,000 字
1984 年 4 月第 1 版 1984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7,000

书号 11001·553 定价 2.70 元

（只限国内发行）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杜鲁门当政的初年	(5)
第一节 哈里·杜鲁门	(5)
第二节 复员和复原	(8)
第三节 满怀希望的和平步骤	(14)
第四节 波茨坦	(17)
第五节 冷战和崩溃的联盟(1945—1947年)	(23)
第六节 杜鲁门主义与马歇尔计划	(45)
第七节 “公平施政”的开端	(51)
第二章 名副其实的总统	(63)
第一节 杜鲁门和1948年大选	(63)
第二节 1949—1952年的“公平施政”	(72)
第三节 民权, 希斯案和麦卡锡主义	(78)
第四节 遏制的继续	(87)
第五节 在远东的失败	(95)
第六节 杜鲁门与麦克阿瑟的争吵	(107)
第七节 民主党的衰败	(113)
第三章 艾森豪威尔的第一个任期	(116)
第一节 1952年大选	(116)
第二节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	(124)
第三节 新共和主义	(130)
第四节 麦卡锡主义的衰退	(142)
第五节 约翰·杜勒斯的边缘政策	(150)

第六节 谋求和平	(169)
第四章 第二届艾森豪威尔政府	(175)
第一节 我们仍旧喜欢艾克	(175)
第二节 国内政策和发展(1957—1960年)	(180)
第三节 富裕的美国	(189)
第四节 艾森豪威尔、黑人、民权	(203)
第五节 冷战(1957—1961年)	(212)
第六节 睦邻政策的没落	(226)
第七节 对艾森豪威尔年代的评价	(236)
第五章 美国的“新边疆”	(241)
第一节 1960年大选	(241)
第二节 约翰·肯尼迪	(249)
第三节 配备“新边疆”人员	(253)
第四节 “新边疆”透视	(259)
第五节 拉丁美洲问题	(271)
第六节 冷战变为武装休战	(280)
第七节 老挝和越南	(287)
第八节 肯尼迪和黑人革命	(294)
第六章 民主党继续执政	(305)
第一节 肯尼迪任期的第三年即最后一年	(305)
第二节 总统遇刺	(313)
第三节 对肯尼迪政府的评价	(318)
第四节 林登·贝恩斯·约翰逊	(324)
第五节 人事更迭	(331)
第六节 初期的林登·约翰逊政府	(337)
第七节 1964年大选	(345)
第七章 “约翰逊牌”	(355)
第一节 “伟大社会”	(355)
第二节 约翰逊政府的对外政策	(365)
第三节 越南	(374)

第四节	持续不断的黑人革命	(384)
第五节	对约翰逊政府的估价	(392)
第六节	1968年大选之年的意外事件：民主党的被抛弃	(399)
第八章	尼克松重返政坛	(412)
第一节	尼克松政府	(412)
第二节	尼克松与国内舞台	(417)
第三节	尼克松与外交	(426)
第四节	印度支那——又延长了四年的战争	(432)
第五节	七十年代的美国	(443)
第六节	1972年大选	(454)
第七节	对尼克松政府的评价	(463)
索 引		(470)

前 言

本卷从 1945 年写起。在这一年，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战争造成约三十四万美国人死亡，七十多万美国人受伤。俄国有六百万到七百万军人牺牲（另有一千万到一千二百万平民死亡）。德国有三百多万军人阵亡；日本则有约一百二十万军人战死。在战争结束和经受了这些惊人的统计数字所表明的伤亡之后，只有美国和俄国仍然保持着世界强国的地位。又唯有美国，凭借其经济实力、资源及其未遭破坏的工业力量，才可称得上超级大国。美国与俄国直到战争的最后一天仍然是盟友，尽管两国关系在战时就不时因各种因素而变得十分紧张。在战争最后几个月征服日本的行动中，美国三军参谋长曾指望俄国军队来收拾亚洲大陆上的庞大日本部队。在雅尔塔会议上，俄国同意在击败德军之后三个月参加盟国的太平洋行动。其后在波茨坦会议上，斯大林提出俄国参战的日期为 8 月 8 日。然而在俄国部队按计划对日本采取行动的前两天，美国在广岛爆炸了原子时代第一件可怕的新式武器，造成了骇人听闻的后果。8 月 9 日，正当俄军在满洲与日军交火时，美国在长崎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第二天，日本内阁决定投降，并于 8 月 14 日宣布，尽管正式的投降仪式到 1945 年 9 月 2 日才在停泊于东京湾的“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

战后年代许多在投降后进行的研究表明，日本早已处于崩

2 溃的边缘。有人断言,俄国人的参战和美国投掷原子弹都是不必要的,因为日本人已十分接近于彻底败亡。美国海军承认,当时的攻击目标只有日本沿海水域中的渡船了。日军固然很可能在美军入侵时宁战勿降,但是日本的困境和原子弹的性质却引起了下述历史上的疑问:投掷原子弹是否可能是出于非军事方面的考虑。研究这种可能性的历史学家认为,美国对俄国人行动感到恼火以及美国想对苏联拥有某种控制力量这样一种打算,可能是投掷原子弹的动机。例如,他们提出疑问,为什么对人所共知的日本求和试探不加理睬?还有对首次使用原子武器的其他类似的困惑感甚或罪恶感也促使人们寻根究底,这又引起了一连串问题,却得不到完满的解答。美国和俄国,如本卷下面将要叙述的,在冷战的纠葛中摆开了敌对的架势,因而历史学家越来越注意研究战争年代和战后初期年代,以解释近年来美国对外政策的方向及其实施。

就国内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如历次战争一样,在各方面加速了美国社会的演变。由于战争年代的压力和逼迫,许多传统的看法消融了。家庭结构已不可能再恢复原状。大批妇女加入了劳动大军。尽管有千百万男子复员,妇女仍在劳动力方面甚至在军队中起着更加持久而又日益重要的作用。且不论是福是祸,由于新出现的经济自由,由于海外新天地的见识和新文化的濡染而产生的强烈意识,美国青年进一步摆脱了家庭权威和家族的束缚。家庭和离异出来的单身人的加速迁徙,也是引起变革的一个因素。为数颇为可观的一部分人从南方许多州和阿巴拉契亚山脉的边界州流出,涌进洛杉矶、芝加哥、底特律、阿克伦这样一些大城市。美国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大大加速了。构成这种迁移的一部分的许多黑人发现,北方工业城市中

种族主义日趋严重。在城市中，他们发现白人的对立情绪很强烈，白人认为黑人的流入威胁了他们的就业，当黑人试图住进原先完全是白人居住的考究的居民区时白人常常采取粗暴的反对行动。在战时，底特律、洛杉矶和纽约的哈莱姆区等地曾发生过暴动。然而黑人自己也表露了新的战斗精神。通过参加为捍卫民主传统而进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黑人进一步看清了美国的理想与美国的现实之间的鸿沟。他们在广大城市地区增强了的政治力量，为他们早先争取平等的斗争增加了新的威力。黑人，在战时为实现这一目标未能取得多少进展，然而他们日益提高的觉悟以及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的新机会却构成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成熟的黑人革命的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使得美国在意识形态方面比三十年代更加保守。人们对于战争年代的动乱以及大萧条和新政所带来的许多变化感到厌倦。经济进一步积聚于大公司，这些大公司是战时合同的主要承包者，它们由于战争年代放松了反托拉斯法而获利。刚从战时动员的经济管制工作脱身出来的领取象征性薪俸的企业界人士，依然是与政府及其下属机构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新的强大力量。武装部队所关心的只是三军内部的竞争以及他们所认为的自己在战后的全球性作用，因而此时他们的人数达数百万之多，远非战前的几十万了。他们要求得到更多的飞机、舰艇和装备，以起到他们希望起的作用。他们很快就在企业界和国会中找到了同盟者，并得到舆论的支持。由于这些因素的结合以及对苏美冲突的恐惧，于是产生了艾森豪威尔总统后来警告美国人民时所说的“军界—工业界集团”这样一个强大的联盟。

当富兰克林·罗斯福于1945年4月12日突然逝世时，哈

里·杜鲁门一下子负起了战后年代上述的种种责任，处理上述种种复杂的事务。罗斯福总统 1944 年的竞选纲领及其竞选活动表明，他显然试图继续推行新政时期的许多社会改革主张。然而，杜鲁门却加进了自己的某些见解，由于碰到通常持敌对态度的国会，他几乎未能向这些目标迈进一步。在战后年代，美国念念不忘于那些因共产主义的扩张和竞争而引起的种种真实的或虚构的恐惧以及这种担忧所要求作出的反应，因而逐步卷入全球性事务。冷战的态度和行动将在整个下一代中在国内问题和对外政策上支配美国人民。

第一章

杜鲁门当政的初年

第一节 哈里·杜鲁门

紧接着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逝世后，哈里·杜鲁门就任美国总统，也许没有哪一个副总统象他在这样一种极度艰辛的时刻承当大任的了。杜鲁门只做了大约几个星期的副总统，还很少或根本没有机会去熟悉罗斯福最亲近的顾问以及纷至沓来的绝密事件。他不论任密苏里州国会参议员时抑或任其他职务时，都很少或没有处理对外政策和国家事务的经验；然而欧洲战场最后几周的军机要务和相应的重大决策却是刻不容缓的。必须调动军队向日本发动最后的猛攻，还有那件玄妙莫测而又甚可畏惧的原子武器也即将造好。来替美国担当这些重大责任的既非一个政治上的大人物亦非一个显赫的行政官员，甚至连一个参议院头面人物也算不上，相反，他只不过是一个典型的带有美国中部特征和背景的平凡的政治人物罢了。

杜鲁门于1884年5月8日出生在密苏里州西南部的拉马尔乡下，是约翰·杜鲁门和马瑟·埃伦·杜鲁门的孩子，他们两人也都出生在这个地区。杜鲁门的祖父母是从弗吉尼亚州和肯塔基州向西迁移到密苏里州西部地区的，因而杜鲁门家在很多方面具有那种刚强而又谦逊的边疆居民的特征，他们的活动范围

局限于农场和小镇。哈里·杜鲁门(他那作为中间名的大写字母S.实际上不代表任何东西)深受他母亲的影响。她的浸礼会派信仰虽然没有禁绝娱乐和音乐,但这种信仰强调严肃的责任感并注重履行职责所必备之性格的自我锤炼。十岁时患的一场病以及老早就不得不带上眼镜,使哈里在童年时代就脱离了户外玩耍而钻进了书堆。他专读历史典籍,从普鲁塔克、卡莱尔至美国内战,一直到美国历届总统的政绩都读了。他还抽空练得一手好钢琴,以致他曾一度考虑是否要从事音乐家的生涯。

杜鲁门家曾在杰克逊县及其附近地区搬迁过好几次,最后才在堪萨斯城以南几英里处的独立城定居下来。从独立城中学高中毕业后的几年中,哈里干过好多行当,诸如银行职员和建筑公司计时员。他还不得不去经管他家的农场,因为他的父亲对此缺乏能力和兴趣。后来,经父亲的引导,他进入政界。当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杜鲁门所在的国民警卫队分队改编为第三十五师的第一百二十九野战炮团。杜鲁门指挥的炮兵连在欧洲进行了连续不断的作战,因而战争结束时杜鲁门晋升至陆军少校。战地指挥极大地加强了她的自信心。他复员返家后,与恋爱多年的女友贝斯·华莱士结了婚。

当战后的经济衰退降临到农业地区时,堪萨斯城一家杜鲁门入股的男用服饰大商号倒闭了。虽然杜鲁门的合股人不得不决定宣布破产而脱身,但杜鲁门还是偿还了所有的债务,尽管有些债务是花了好多年的时间才偿清的。凭借对地方政治的那么一点经验以及与彭德格斯特大亨^①的兄弟迈克的友谊,杜鲁门获得了彭德格斯特所控制的小集团的支持,参加竞选县法官(这

^① 托马斯·彭德格斯特(1872—1945), 1910—1939年间,他是公认的堪萨斯城和密苏里州的民主党魁。——译者

在密苏里州是县政府的一个行政官，而不是一个法官职位）。杜鲁门赢得了这场艰苦的竞选，主持了一届高效能、负盛望的县政府。由于杜鲁门和彭德格斯特集团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以及他很早就抱有新政主义观点，他并不是汤姆·彭德格斯特集团在选择参议员候选人时最理想的人选。然而在1934年，当比较保守的人选都拒绝与在任的共和党参议员竞选时，他终于成了参议员候选人。以后杜鲁门在美国参议院内部互相吸引的小圈子中间平淡地，甚至也许是毫无个人主见地度过了六年。在参议院里，他始终不渝地支持本党政纲。1940年，尽管彭德格斯特集团已由于汤姆·彭德格斯特在交纳所得税中的欺诈行为被定罪而瓦解，杜鲁门仍及时通过自己的努力重新当选为参议员。在他的第二个任期中，杜鲁门由于担任一个调查国防费用开支情况的特别委员会的主席，而赢得了全国范围的声望。虽然这个杜鲁门委员会（习惯上都这么称呼它）并没有故意去沽名钓誉，然而它对于牟取暴利、偷工减料、偏袒大企业，以及对于那些构成国防预算一个可观部分的院外活动集团优厚的佣金所进行的严厉追究，使这位密苏里州参议员受到千百万公民的交口称誉。在公众中的声望，加上他出身于边界州并严守党纪，使得哈里·杜鲁门（他对党的忠诚可能也比反复无常的亨利·华莱士更为可靠）在1944年成为副总统候选人。

在总统任期中，杜鲁门显示出一种令人惊讶的增进才干的能力。在很多方面，他是一个普通老百姓，讲话时不善词令，爱用俚语，喜欢开门见山，不爱矫揉造作的举止，态度友好而自信。有时他对党派关系和老朋友过于信赖，以致使自己被一个“密苏里帮”所包围，而这个帮由于其中有些人贪污受贿而声名狼藉。急躁的性格导致他发表了一些冲动的、他和他的支持者（他的支

持者很多)都永远追悔莫及的公开声明。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块写着“决断在我”的小标牌,证明他敢于决策,虽然若干强硬派的顾问强烈地影响着杜鲁门在战后对外政策中所采取的有争议的强硬路线。与他前任的辉煌的国内政绩相比,杜鲁门的国内政绩算不上突出。然而从当时的政治环境来看,特别是同他的后任所处的政治环境相比,杜鲁门的国内政绩是完全说得过去的。他在自己的任期内进行了许多艰苦而孤立的斗争。因为战后国内出现了许多新问题。

第二节 复员和复原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传统上,美国武装部队给人的印象一直是公民即士兵或公民即军队。从殖民地战争时代起,公民就从火炉上方的钉子上摘下他的滑膛枪来对付国家或地方遇到的威胁。而一旦危险过去,滑膛枪立即就放回原处,枪的使用者也回到他正常的工作岗位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末期阶段和战后最初几个月就完全是这样一种情形,因而公众和国会关于武装部队受到威胁的呼声不断高涨,用杜鲁门的话来讲,伤脑筋的与其说是复员问题不如说是离散问题。

早在1942年12月,参谋总长马歇尔就开始考虑复员问题了。1944年9月,陆军部宣布了一项正式方案,参照服役年限、参战经历、立功多寡、靠其抚养的子女数目等因素评定军人的积分。原来规定一千二百三十万军中服役的男女军人,特别是七百六十万海外驻军,退伍所必需的最低积分是八十五。随着日本的投降,陆军部除了规定大多数年过三十五岁的官兵离队外,还再次降低“积分制”的标准以加快退伍。然而,麦克阿瑟将

军发表了一项越权声明——他那人所共知的多次越权声明之一——,宣布他只要二十万军队而不是原先估计的五十万军队来占领日本。由于陆军部业已决定战后军队的规模应从一百二十万人增加到二百五十万人,麦克阿瑟的这一声明,对于军人家属和有组织的利益集团早已向着各自的国会议员进行的退伍鼓动,正好是火上加油。迫于国会的抱怨,五角大楼在1945年12月三次降低了退伍所必需的积分标准。这就使得在海外的能够退伍的人数超过了船舶的运输能力。尽管把十艘航空母舰、六艘战列舰、二十六艘巡洋舰改成了运兵船,许多退伍者还是在海外望洋兴叹。由于别无他法可想,陆军部不得不宣布,为了解决在海外的各种问题,今后三个月的退伍期需要延长到六个月。这条消息,加上新任陆军部长罗伯特·帕特森在其太平洋之行中所发表的唐突谈话,引起了部队的示威和反抗,成了1945年圣诞节和1946年1月份的头条新闻。美军的骚动遍及世界各地,但绝大多数发生在太平洋战区,其中规模最大的发生在菲律宾。驻在该群岛的大约二十三万军队不能理解为什么驻在该群岛的军队比需要用来占领日本的美军还要多。

许多示威者仅仅是聚集起来,签署请愿书或联名给国会打电报。在马尼拉,大约两万名士兵强行会见官长,要求说明情况。在德国的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当四千名军人试图也这样干时,他们被刺刀赶了回去。在几乎所有这类事件中,士兵都得到非常宽大的处理,这些事件本身也就被故意遗忘了。除了明显的思乡情绪外,士兵们一点也不清楚把作战舰艇改成运兵船所牵涉到的时间和困难,以及为什么需要美国军队去占领欧洲。行政官员们所发出的相互冲突的通告,使很多人在头脑中产生了怀疑,传说中的政府优待军官苛待士兵的做法更增加了那些

引起普遍不满的因素。1946年6月30日,也就是战胜日本九个月,美国军队从八百万减少到一百八十万,恐怕这是美国最后一次按照它的传统匆忙地复员军队了。

与美国历史上任何一次战争之后的退伍工作都不同的是,二次大战老兵退伍后,特别受惠于政府实行的慷慨和同情的政策。1944年6月,罗斯福签署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军人调整法,即通常所说的士兵权利法案(GI Bill of Rights)^①。所有服役超过九十天并光荣退伍的士兵,都可获得现金资助以完成中等或大学教育;都可向退伍军人管理署借贷以购置房屋、农场,或作营业资本;如果找不到工作,还可以享受一年失业救济金。各行各业雇用了大部分申请就业者,但政府的特设助学金仍被大量地使用了。到1956年教育津贴终止时,有将近八百万退伍军人依靠政府的资助完成了全部或部分学校教育。他们每人每年得到五百美元的学费和书本费,外加单身汉每月五十美元、已婚者每月七十五美元的生活费。后来,生活费分别增加到每月七十五美元和一百零五美元。联邦政府在这项计划中总共支出了一百四十五亿美元。尽管其中很大一部分用于复员军人的生活费,还是有相当多的金钱流进了学院和大学,这就使得该项计划成了在政府资助教育的历史上一项最有深远意义的措施。1943年3月通过的一项法案的条款规定为那些残废退伍军人提供受到特别教育和训练的条件。那些需要医药或精神上综合护理的退伍军人则被收进专门医疗单位。退伍军人管理署所辖各医院的扩大,使战争留下的伤残者能继续得到治疗护理。

^① GI即“government issue”(政府发给)的缩写,用来标明美军的任何标准装备,无论是刺刀,还是衬衫或火腿罐头。但很快士兵们就用这两个缩写字母来称呼他们自己。

杜鲁门总统和他的顾问们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来考虑复原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巨大困难和三十年代的大萧条经常使人们心有余悸。在战胜日本日之前,杜鲁门就拟定了一项计划,包括逐步终止和取消军事订货合同,并采取行政措施以期稳定工资、物价和房租。战时实行的生产控制也打算降低到可能的最低限度。复原措施的某些方面,例如经过周密计划的把军人从战争状态过渡到和平生活中来的措施,证明是一帆风顺的。虽然在完成社会和经济的全面变革中所遇到的混乱和骚动远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为少,然而在整个国民经济复原时期,国会与总统之间,劳方与资方之间,还是发生了剧烈的政治上的混战。几乎没有人喜欢物价管理局,但是大多数人认为物价管理局在战时对房租和稀有物品的价格实行管制还是有必要的。随着战胜日本日的到来,要求撤销所有管制的叫嚷甚嚣尘上,尽管那些有固定收入者(现在包括许多领取教育津贴的退伍军人)预料到,如果,更多地撤销价格管制,他们将严重地遭受到通货膨胀之害,但是许多商人和农场主却囤积商品,以期抬高市价,结束价格管制。任期即将届满的国会投票通过使物管局的存在延长到1946年7月1日,在这一期间,它可以把生活指数的上升压低到百分之三。由于压力不断增加,国会就进一步实行物价管制进行了辩论。甚至连消费者,由于拥有包括个人存款和政府公债在内的一千三百六十四亿美元的空前未有的储蓄,也狂热地愿以两倍于平时的价格购置稀有的尼龙制品、牛肉、汽车以及公寓。为了取消所有管制、回复到“自由”经济的轨道,商界发动了一个激烈而广泛的攻势。各种社会团体都向他们的国会议员请愿。各商会向总统呈递了愤慨的签名书,要求他“拯救自由企业制度”。数以百万计的金钱用来大登广告宣传结束管制这一主张。在商界